

海灣沙丘遺址不應只是 季節性活動居址

蕭一亭

在珠江三角洲前緣海濱或海島周圍，廣泛分佈著一種沙丘(或稱沙堤)古文化遺址。這些遺址大都位於當時的海灣。由於它的發現為南海地理環境研究、古人類活動歷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因而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①但是，目前學術界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沙丘遺址在原始社會和商周時期只是一種季節性的活動居址。^②活動時間為冬春二節。香港博物館和廣東省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也採用了這種觀點。^③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通過考古發掘報告、研究論文、陳列說明等，我們可以了解到認為沙丘遺址是季節性活動居址的觀點其主要根據有下列幾點：

- (一) 遺址範圍小，文化層堆積薄，說明聚落規模小，居住時間也較短。
- (二) 每年夏秋有颱風襲擊，這時他們應回大陸「大本營」，冬春季節再渡海上島。
- (三) 生產工具中缺少適於農耕的大型石器，而多中、小型石鏃、網墜。
- (四) 95%的陶器殘片是用於炊煮食物的夾砂陶釜。

筆者認為，由於考古工作的深入，新的資料大量出現，以上根據都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了動搖。從而使我們更加堅信，南海廣泛分佈的海灣沙丘遺址，是越族先民賴以生存的基礎，不是季節性的活動場所。雖然在幾千年的沙丘生涯中，他們也曾因海平面的波動，或遇到特大風暴而被迫長期或暫時離開

某些沙丘故居。但總的來說，海灣沙丘是當時部分南越先民得以勞動、生息、繁衍的良好選擇。

首先，我們從宏觀上考察沙丘遺址的分佈區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目前已發現上百處沙丘遺址。主要分佈在珠海、澳門、深圳、香港，大都在珠江口的南段，而珠江三角洲中段，如中山北部、順德、東莞、番禺等地則廣泛分佈著貝丘遺址，在粵北地區則全為山崗式或台地遺址。從文化內涵看，沙丘遺址與珠江三角洲中部的貝丘遺址、北部的崗地遺址甚至與江西、湖南的原始文化都有聯繫。不管沙丘先民是自中北部的某一支，在珠江三角洲南端這個特定的區域內，已形成一種較有特點的經濟文化類型。

其次，以沙丘遺址的地理環境看，這裡很適合於人類生活。僅珠海境內目前發現的沙丘遺址已達三十餘處，其中經正式發掘的有淇澳島的後沙灣、東澳灣；三灶島的草堂灣；前山鎮的南沙灣；香洲區的棱角咀；平沙的棠下環等六處。^④遺址的面積較大，都有上萬平方米(部分遺址如平沙棠下環遺址面積達到三萬平方米)被大部分破壞之後現仍存五、六千平方米。這些遺址都位於現代海灣、島灣和山灣(即古代島灣)的沙丘上、沙堤上。灣口向東、東南、西南方向，沙堤的高度一般均比高潮位略高。由於深入陸地，風浪相對也較小，先民們在沙堤上栖息，不虞海潮侵淹，同時，這些海灣沙丘一般均是島嶼小河流的河口(遺址附近，一定能見到一股山泉或一條溪流從近處山崗或遠山蜿蜒而來，流經遺址附近入海^⑤)。先民們在此有淡水可以飲用。在這裡，先民出則可以捕魚撈蝦，入則可以狩獵採集和從事農業生產，居

Xiao Yiting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Zhuhai Municipal Museum, China

蕭一亭：珠海市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則安全便利，因而是當時極為適於人類生活的場所。

其三，從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沙丘遺址會成為相對穩定的聚落。

一 沙丘上的住宅

隨著沙丘遺址的大量發現，特別是遺址中一些確定的文化層的揭露，人們對沙丘上曾否住人這一問題，從持否定態度轉到持肯定態度。但是，對先民的居住條件、房屋結構則所知甚少，其主要原因當然是不言而喻的：沙丘的活動性較大，要保存距今幾千年前的遺址實非易事。不過，考古工作者還是找到了些許蛛絲馬跡。

(一) 香港考古學家通過遺址發掘中觀察土壤顏色變化而辨別出若干與早期房屋有關的柱洞。

(二) 廣東的考古學家在深圳咸頭嶺遺址發現房基面用灰褐色土鋪墊，面積長7.7、寬4.8厚0.13-0.2m。還發現14個分佈規律不整齊的柱洞；在珠海香洲稜角咀遺址發現倒塌的木骨泥牆的燒土塊⁽⁶⁾。這些燒土塊一面抹平，一面夾有竹、木或蘆條之類的印痕。

如果這些發現無誤的話，那麼當時建房，當先是在沙丘上立柱打樁，然後在編織的竹、木或蘆條的牆壁上面敷泥，在地面上鋪黑褐色土經燒烤而成的。當然，我們不能想象當時的房子能一勞永逸。不要說古代，就是今天北方農村的一些房子，在雨季到來之前也要進行大修整。遠古南方就更不容易了，或許一年要修幾次！

二 沙丘上的製陶業

沙丘遺址中出土大量陶器，其種類主要有釜、罐、豆、鉢、盆、碗、盂等，陶器紋飾有彩陶、印紋陶、素面陶等。這些陶器大都是沙丘先民自己生產的。之所以這樣說，不僅是因為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在海島、海

濱這樣特殊的地理條件中，人們的商品交換不可能很頻繁，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主要來源於自己的兩手這樣的一般推理，而且因為在沙丘遺址中常出有先民們製造陶器的工具。在珠海前山水涌遺址中曾出土一件拍製繩紋的印模(原報告稱陶拍)，紅色砂質岩，正面陰刻繩紋，背面磨光。類似的拍陶工具在三灶草堂灣遺址，平沙棠下環遺址有均發現。在珠海淇澳島東澳灣遺址，曾發現三處燒土石塊組成的遺蹟。這些遺址的地層年代也當在新石器時代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筆者推測與製陶有關。遺蹟A分為兩部分，「北部為紅燒土，由於焙燒，土色泛青，大部份則呈紅褐色，十分堅硬，形如半圓狀，中央一條溝槽，開口於西部，東部封閉。在東部發現三個台形陶支腳，周圍散見一些釜的殘片。燒土厚度為12-30厘米不等，最大半徑為60厘米；燒土的南部為若干石塊，分佈於燒土南部，長130厘米、寬95厘米的範圍內...」。遺蹟C為一平面呈圓形，直徑96厘米，四周有燒土壁(殘高5-7厘米)，西部和壁側有通道(火道)的遺蹟，其間出土陶支腳、夾砂繩紋陶片、石塊、紅燒土等物，周圍發現斝形器。發掘者認為「很有可能是炊煮遺跡」。但灶坑是用不著這樣大範圍的。在珠海已發掘和調查的多處遺址中，大都出有陶斝、雖為殘器，然也可以看出大的斝長寬可達40-50厘米，算為陶斝的主要部件，這樣眾多的陶斝當與製陶有關。此外，陶豆上的圓點紋、水波紋、彩陶盤上的彩繪波浪紋、圈足上的刻劃水波紋等都很有特色。

三 沙丘上的石器製作和加工業

沙丘先民所使用的石器是他們自己製造的，這一點當無異議。但是在甚麼地方製作的？這個問題的解決對判定沙丘先民在島上生活是否是季節性的問題的解決，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是季節性的，則理當在其「大本營」作好充分準備，無須上島後再來製造工具，而在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珠海、深圳、香港、澳門等地的沙丘遺址之中，都大量發現當時製作石器用過的礪石。石器種類有鏃、斧、穿孔石器、網墜，石球、鏃、錘等，出土最多的是鏃、網墜，而石斧、石

球次之。這些石器的石質多為沙岩、變質岩、沉積板岩，不少石球、網墜是採用天然礫石加工而成。這些石料都是島上本身所具有的(在香港石角咀遺址曾出土石毛胚、石環心和完整的石環)。因而，我們認為這些石器是沙丘先民就地製造的。

四 沙丘上的紡織業

沙丘先民已經脫離了那種以樹皮、樹葉禦寒的年代，穿上自己或家人親手紡織的衣服。眾多的沙丘遺址中都出土用於紡紗的工具—紡輪。多為陶質，也有石質的。其形狀平面為圓形，有的兩面隆起，斷面呈橢圓形，有的一面平一面突起如圓台，有的剖面為弧邊梯形或梯形，有的剖面呈長方形或多邊形。紡輪多無紋飾，也有少量紅色的。紡輪直徑3.2厘米左右，厚度0.9厘米左右，也有個別厚達1.9厘米的。這些發現說明沙丘先民對麻、棉等植物的功能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他們在島上採集這些植物進行加工處理，用紡輪紡成紗線，編成繩結成網用來打漁；也用紗織成布用以禦寒。

五 沙丘上的鑄銅業

在海島或海濱的沙丘上鑄銅實非易事，甚至不可思議。但在研究沙丘上出土的文物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商周時期沙丘先民確實鑄造過青銅器。1988年在珠海市淇澳島婆灣遺址出土一件鑄銅陶範，長14.5、寬9.6厘米，夾砂粗陶，燒結較硬，是鑄造銅斧的雙合範的一邊。在淇澳島南門遺址，採集到一鑄銅石範，在香港赤鱗角遺址、南丫島遺址也多次出土這種石質鑄銅斧的對範。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94年4月在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經科學發掘的地層中，發現相當於中原商代中晚期的、鑄造青銅鑿的陶範。

六 沙丘上的裝飾品

在沙丘遺址中，我們常可以見到一種磨製精美的穿孔石飾、玉飾。如珠海後沙灣遺址二期出土一件灰色板岩質，整體呈弧形，弧長5厘米，厚0.8厘米，一端鑽孔，便於穿繩佩帶。在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出土一大批精美的裝飾品，有玉石串、玉璜、玉玦、有肩

石環等。其磨光、拋光、鑽孔技術都達到了令人驚喜的地步。在香港大嶼山蟹地灣也出土一套精美的磨製石環。這些物品顯示了工匠們精湛的手藝，也反映出沙丘先民的審美情趣。

七 沙丘先民的經濟

沙丘先民的主要經濟活動是捕撈魚、蝦、貝類等水產物。也主要是為了取得這些食物，他們在沙丘上安營扎寨。遺址中出土大量用於撈捕魚、蝦用的網墜和食後拋棄的魚類骨骸，就是這種經濟的反映。由於單一的食物載是帶有季節性，在捕魚的淡季，人們必須依靠其它經濟來補充。於是，採集和狩獵成為先民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僅此還是不夠的，他們為了取得較穩定的收成，已開始了農業生產。根據筆者對珠海所出土石器統計，主要用於掘土的石鏟在這裡出土最多，佔全部石器的32%^①(網墜佔22%，用於製造石器的礪石佔26%，石斧佔6.5%，石球佔6%)。石鏟多為中小型器，但也不乏大器，如後沙灣遺址曾出土長達15厘米的大型石鏟。在深圳的多處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中都出土石犁等農具和石磨盤、石磨棒等碾米工具。^②這都是沙丘先民進行農業生產的證明。沙丘先民居於海灣，面對大海，在他們的背後往往有廣大的丘陵和瀉湖。他們所在的島嶼也不是彈丸之地，常有幾平方公里，甚至十幾平方公里^③，其中有不少肥沃的、可供先民農業耕作的土地。

另外，一般認為沙丘先民是在冬春二季到此居住，原因是夏秋二季有颱風。但是，最近香港考古學家鄧聰先生和黃鎮璋先生提出疑問，在《大灣文化試論》一文中指出：「據毗鄰於大鵬灣的大亞灣的灣內各季度魚類變化資料顯示，夏季出現種數居110種，其次是春季和秋季分別為81.82種，冬季最少，只有74種。可能是有些洄游性種到了冬季離開了大亞灣，游向灣外的深水區。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同樣大鵬灣地區一帶，冬春二季恰巧是漁獲最少的季節。如果我們考慮海濱沙堤遺址的出現，與史前人類尋求海洋資源有更大的關係，即夏、秋可能是更理想的季

詳。季性颱風只是短暫的，對出海的漁民來說，較優先考慮的應是漁穫方面。」這些分析無疑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既然夏、秋二季有人居住，春冬二季沙丘上住人更無問題。這樣一年四季都能住人的地方，先民們又何必遷來遷去？

綜合以上分析得知：在原始社會晚期和相當於中原的商周時期，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海島和海濱，居住著一批越族的先民，他們多選擇在海灣的沙丘上安營扎寨。這裡的自然條件很適於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沙丘遺址的面積都較大，通常在一萬平方米以上。雖然居住的時間很長，但由於在沙堤上，很難形成和保存很厚的文化堆積層。他們以捕魚為主要經濟，採集、狩獵、農業為重要的補充。由於食物來源較為豐富，先民的人口也發展較快(僅珠海一地目前發現的遺址就有三十餘處，沒有被發現和沒有保存下來的當然還有)。生活也比較穩定。他們在居地辦起了製陶業、紡織業，自己製造生產工具，有的甚至會製造青銅器。由於愛美的天性，先民們製造了不少磨製精美的石飾、玉飾。他們的房子能擋得住一般的風浪，當特大風暴來臨之時，他們可以在附近的山崗避難，當然也可以想像沙丘上曾發生屋倒人天的慘劇。但幸存者還是會重整旗鼓，在沙丘上重建家園。這裡的食物誘惑力太大，以致先民不惜代價。這也是沙丘古遺址文化堆積能表現一定的延續性的原因之一。

雖然大部份沙丘遺址的文化堆積與粵北贛中地區的一些崗地遺址相比顯得比較單薄；雖然單個沙丘遺址所出的文物一般顯得比較零星，似乎有些偶然，但如果考慮到這裡的埋藏條件，認識到沙丘上保存遺址遺物的概率與崗地遺址的差別，則會看到沙丘遺址揭示的沙丘文化的內涵，並能從許多偶然的現象中找到起支配作用的內在規律。基於以上認識，我們認為：就整個沙丘遺址而言，當是許多相對穩定的聚落，而不應只是季節性的活動居址。

註釋

- (1) 嚴文明：〈珠海考古散記〉，《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朱非素：〈珠海考古研究新成果〉，《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李子文：〈珠海史前文化初論〉，(同上)。《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 (2) 廣東省博物館、珠海市博物館：〈廣東珠海市淇澳島東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9期，《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
 - (3) 香港博物館：「此等聚落，規模不大，或只屬短暫停留」。廣東省博物館：「...沙丘遺址可能是冬春季節性聚落遺址。」
 - (4) 李子文：〈淇澳島後沙灣遺址發掘〉，梁振興：〈三灶草堂灣遺址發掘〉，趙善德：〈前山鎮南沙灣遺址發掘〉，龍家有：〈香港稜角咀遺址發掘〉，《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李岩：〈廣東珠海市淇澳島東澳遺址發掘簡報〉，(同2)。
- 平沙棠下環遺址1994年3月至5月初由廣東省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開方16個，揭露面積400平方米。是前正在進行室內整理。
- (5) 朱非素：〈珠海考古研究新成果〉，(同1)。
 - (6) 《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
 - (7) 珠海經正式發掘的調查所得石器：石鏃53件、礮石43件、網墜36件、斧11件、石球10件、穿孔石飾3件、大型穿孔石器1件、石錘3件。(據《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另：平沙棠下環遺址出土許多石

器，發掘者初步統計達500餘件。

- (8) 莫稚：〈深圳市考古重要發現〉，《廣東文物考古資料專輯》，第一輯。
- (9) 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海洋出版社；黃鑽國等：《珠江三角洲形成發育演變》，科普出版社廣東分社。李平日：〈六千年來珠海地理環境演變與古文化遺存〉，《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李文認為：「海平面在距今六千年前後已升至現今的高度，其後雖有過多次波動，但總的情況已與現今相差不大。」

The Sandbar Sites in the Estuarine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Should Not Be for Seasonal Inhabitation Only

Xiao Yiti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by archaeologists and scholars that the large number of sandbar sites in the estuarine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were occupied only in winter and spring when typhoon did not prevail.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however, holds a different opinion. A number of arguments justified by current archaeological data have been enumerated to support his view.

The writer points out that these sites have an average area of over 10,000 square metres, vast enough for a good part of the site to extend far inland to stay well away from stormy waves and tidal harassment. The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 of these sites were favourable for human settlement; freshwater supply could often be obtained from nearby streams. The sites also reveal vestiges of primitive houses, some with plastered floors and others with stilted structures or wattle-and-daub wall foundations. Though these houses could hardly withstand typhoon attacks, they were at least quite stable dwellings for the sandbar settlers. These sites also yielded abundant artefacts, among which are a great variety of locally fabricated pottery vessels with either plain or decorated surfaces, and stone implements made

from local pebbles. The discovery of pottery and stone spindle whorls has proved that weaving was practised, probably to produce fabrics for clothing or to spin out yarns for fishing-nets. Though a bit inconceivable, bronze casting did exist in these sites, evidenced by the discovery of clay and stone mould pieces for this purpose. The aesthetic appeal and remarkable workmanship of the sandbar occupants is suggested by the finely crafted stone and jade ornaments among the finds.

As a conclusion, these sandbars were likely to be inhabited all year round by populations subsisting mainly on fishing, supplemented by gathering, hunting and farming. The suffering brought by the summer and autumn monsoon was offset by a bigger catch from the sea in these two seasons. The coastal location of the sandbars had made accumulations of cultural remains relatively thin and chaotic, which might have evoked incorrect assumptions. Th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around this region were great attractions to the ancient people and therefore, comparatively stable settlements were established despite the seasonal attack of the hazardous typhoons.